

---

# 对旅日爱国华侨杨启樵教授驳斥日本 “南京大屠杀”案否定派的介绍与补充

谢雪桥

---

## (一)

八十年代中,在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国内泛起了一股否定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翻案的浊流,一些人借助报刊连篇累牍地抛出了许多为日本侵略行径辩护的文章。特别是一些日本旧军人的叫嚣,不时在日本报刊上露面。《产经新闻》、《世界日报》、《月曜评论》、《偕行》、《文艺春秋》、《诸君》、《正论》等都是他们的地盘。

翻案文章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把它说成是为了把中国从西方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中日共存共荣,借此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甚至把罪恶推诿于中国。二、否认日军在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其目的也在否认战争侵略性质,推卸责任。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田中正明和铃木明。其代表作是田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下简称《虚构》)和铃木的《“南京大屠杀”的虚幻性》两书。

但是,在日本,也颇不乏正义之士,他们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不时对“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作出有力的反击,从而形成了一个“肯定派”。田中称他们为“大屠杀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享有盛名的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他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是日本有关南京事件的权威著作。另外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

胜一。他著有《中国之行》等许多著作,并为调查南京大屠杀事件到过中国多次。

本来,“南京大屠杀”事件已成定案,主要战犯松井石根已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法庭(以下简称“东庭”)判处绞刑,另一名主犯谷寿夫也被引渡到南京,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多年以来,在日本国内,仍有不少心怀不满的分子,喋喋不休地进行翻案活动,因此形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相比之下,在这场既严重又严肃的斗争中,在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之前,中国方面反而显得十分冷清,很少有驳论文章见诸报端。

有鉴于此,旅日爱国华侨、原日本广岛大学、今姬路市独协大学教授杨启樵先生,出于正义和爱国之心,起而战斗,奋笔疾书,发表了许多反驳日本“虚构派”的文章,连续数载刊登在香港《百姓》半月刊等杂志上。对于杨教授批驳为日军战争罪行翻案的观点,多数读者或许并不了然。故对此作些介绍,还是有必要的。

## (二)

1982年“教科书事件”之后,一贯主张侵略无罪论的田中正明一连做了四件事。一是纠合几名同伙,于当年3月13日控告政府当局,说是因文部省准许使用“违反真实”的教科书,令他们精神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并在教科书碍眼处加以涂黑;二是他在1984年6月25日出版了名为《“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为“皇军”湔雪“冤罪”,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翻案;三是他纠集了三名参加过进攻南京的旧军尉鹈饲敏定、亩本正己和土屋正治,以及评论家板仓由明,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田中主持,目的是以参战者的身份,作伪证翻案。会议作了长达21页的座谈记录,登在12月号的《文艺春秋》上,题为《“南京大屠杀”参战者的证言》,副题是“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报道再也不能忍耐了”等等;四是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建成后,他

在当年12月号《正论》杂志上叫嚣,指责该馆“虚伪”,并提出九点抗议性的质疑,要该馆作答。

杨教授对上述田中丑恶表现,感到忍无可忍,悲愤地说:“南京事件的发生距今不到半世纪,竟有这种谬论出现,千百万屈死冤魂何能瞑目于地下,十万万中国同胞怎能闭口无一言!”于是他专门针对田中连续写了许多驳文,来批判他。这些文章主要有三篇,即《异哉所谓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百姓》1984年8月)、《一个抹煞南京大屠杀的座谈会》(《百姓》1984年12月)、《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驳斥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百姓》1986年1月)。其主要内容如下:

杨教授指出:田中最不满“东庭”,声称南京大屠杀一案是捏造的,是“东庭”听了中国方面的宣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这种以胜者审败者的资料,不足为信。他以为丑化“皇军”的是南京事件,唯有把“东庭”“虚伪的”假面具剥下来,才能究明真相。杨教授指出,由十一国组成的“东庭”,费时两年半,一共召开了数百次会议,有近千人作证,证词上千页,作出的是正确判决。

田中说:南京城有外籍记者十余名,不见有撰过一篇文章,摄过一幅照片。在外国人众目睽睽之下,怎能大开杀戒呢?《虚构》21页)杨教授驳斥说:杀戮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不会邀请记者来“观礼”,而且是逐批分别进行的,要避过一些人的耳目,何难之有?何况在言论箝制之下,日本记者即使有所见闻,也不敢执笔。即便如此,至少有三名从军记者,战后终于发表了隐藏了多年的惨闻。这三名记者一是福岛民社的秦贤助,他于1957年曾在《日本周报》刊载了《浑身鲜血的白虎队》一文;一是《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1956年,他曾在《文艺春秋》特集上刊载了《南京城内的大量屠杀》一文;另一人是《每日新闻》的铃木二郎,他曾在杂志《丸》上刊载了《杀戮俘虏》一文。

田中说,要杀成千上万的人,必须要有组织、思想体系、机关以及工具等等,华中派遣军不具备此足够条件,无法大量屠杀。《虚

构》54页)杨批驳说:这种杀人理论大概牵强附会到德国纳粹党方面去了。其实,日本的杀人思想体系早在昔日制造旅顺大屠杀和济南惨案前就已形成。残暴成性的日军,奉命可以随时随地任意杀人。至于机关和组织,军队便是此中最强大的,而杀人工具,军队中有的是,何况“皇军”有着现代化锐利武器呢?

杨教授说,翻案者几乎都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战后捏造出来的故事,田中在《虚构》中、座谈会中和“九点质疑”中,再三强调,经过他的调查,战前国共双方都无对南京事件的指控,当时城内的第三国人和一百二十名日本记者也从未有人撰文报道。杨教授反驳说,这是弥天大谎,其实在战时,即有国际人士纷纷提出抗议,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就曾无数次向日本大使馆和军部等提出过抗议。连法西斯德国的代表就日军暴行向他的政府报告时也说:“这是整个陆军本身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集团。”(见《人民日报》1982年8月13日)第三国人抨击中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报记者田伯烈,他在事发三个月后,即1938年3月,就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书中列有400多件日军暴行,在伦敦出版。是年7月译成中文在武汉出版,由郭沫若作“序”,另有鹿地亘、青山和夫作序的日译本。当时这本书是被日本军部列为“禁书”的。除田伯烈外,《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华北日报》等等都有过强烈的控诉。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日军)在上海、南京的进击中,杀戮了30万中国人民,这与中国军的死伤者大致相同。”(Edgar P.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至于战后才知牺牲数目,是因为在日军占领下无法实地调查,只有在战后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各方人士的证言才能得出。

中国方面也早有南京事件的讯息。如1938年3月28日的武汉版《大公报》上有南京妇女惨遭蹂躏的消息。同年5月30日的武汉版《申报》上,有六七千中国人在南京被烧死或活埋的报道。而上海黎明书局发行的《文摘战时旬刊》,曾于1938年的八、九、十五及十六号中刊载过南京事件。又如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说:“由于日

军发现了一些武器,便在安全区内大事搜查,数万同胞皆作了枪下鬼。”“带出玄武湖用机枪扫射的至少有八千多人。”(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蒋公谷的《陷京三月记》里说:“(12月14日)晨起,听到枪声断续地响着,那是敌人在射击我们的平民。”《军医蒋为日记摘录》:“(12月27日)几日来敌人的暴行仍然有增无减,总有七八处冲天火光在周围燃烧着。掳妇女,白昼宣淫,竟是司空见惯。”佚名的《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说:“就是难民区的百姓们被其残害者,亦不计其数。”1938年7月《大公报》武汉版一佚名作者的《地狱中的南京》中说:“金陵大学既在难民区内,又与日本大使馆望街对字,而倭兵竟毫无顾忌。”他们“一大队冲入金大图书馆,那里有难民一千五百人,内有不少妇女和小孩,倭兵就污辱了十来个女子。”(《半月文摘》二卷六期 1938年5月)以上都只是点滴报道,当时谁也不能说清全貌,但就这点滴消息,也足以说明南京全貌是个什么样子了。

杨指出,至于当时日本方面发表关于南京事件消息极少,那是因为军队严厉检查的缘故。日本人自己揭罪行,会被认为叛逆媚外,即使在战后也有这个倾向。至今田伯烈的书在某些中学图书馆里是禁放的。当时有所谓“不稳文字取缔法”,文网之森严,谁敢触犯禁忌?那时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遭到禁笔、毁版、检举、投狱的命运。东京大学矢内原忠雄教授,撰写了一篇《国家的理想》,歌颂和平、正义,反对使用武力,就受到围攻,不得不辞职;早稻田大学津田左吉教授发表了一篇《日本支那学使命》,引起御用学者攻击,并牵连其它著作,被毁版、控告。南京方面的忌讳更多,记者不但不能报道日军的暴行,还得讴歌“皇军”的“仁慈”,粉饰南京的“升平”。学者黑田秀俊称这种行为是“双重犯罪”。(《知识人、言论弹压的记录》,1976年1月,白石书店)因此,南京虽有一百多名记者,然而都噤若寒蝉,究竟有几人敢秉笔直书?即使写了,编辑敢付印吗?就是编辑有勇气,又哪能逃得过检查呢?事实上只要看《出版警察报》,就可知道,有关南京事件的被禁文章,1938年1月有

25 篇,2 月有 109 篇,3 月有 48 篇。(转引《现代之眼》1982 年 12 月)

杨教授又说,可是百密一疏,也有从文网中漏出来的,如诗人西条八十,就有一篇描写南京惨状的记事,刊载在 1938 年的《支那事变一年史》上。战后发表此类文章则更多,譬如日本军人佐佐木元胜所写《野战邮政局》就是其中之一。文中这样描述:“(南京)街头仍然燃烧着,近黄昏越来越红”,“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几条街道之间,似乎还留下惨叫呼救的光景。”“扬子江岸留下无数支那兵戮的痕迹。”“城外下关一带,宛如上海的闸北,焚成一片焦土。”“江岸的道路、岸壁和水滩上,(中国)败兵的尸体叠成几重,没有比这个更凄惨的了。”“被长江浊流吞没而漂流着的人不知有多少?我曾经在东京大地震时目睹过尸体重叠的惨状,可是跟这个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丧生于枪弹、刀剑之下者恐怖异常,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被淋上石油烧成焦炭。尸体之旁有庆祝胜利的酒桶,堆积如山,上面有兵士在放哨。战胜国与亡国之间,竟有这样深刻对照的场面。”(黑田秀俊:《知识人、言论弹压的记录》,1976 年 1 月,白石书店,63、64 页)

他还举出一例,“东庭”开审中曾任元凶松井的律师的滝川政次郎,南京陷落时他在北平供职。1938 年春因为南京大屠杀的传闻喧嚣尘上,他就专程去南京探查真相,回来后曾说:“我坐人力车游览,见到许多焚毁的民居,以为是被日机空袭的。我说:‘炸弹的威力真厉害!’车夫说不是,是日本兵放火烧的,又说南京市内的姑娘,不被日军糟踏的一个也没有。”(儿岛襄:《东京裁判》下,84 页)

杨教授最后还揭露了田中为故主松井石根辩护,吹捧松井为圣将的无耻行径和两人的历史关系。那时,田中获得了松井的《阵中日志》,如获至宝,捧为一等资料中的上品,说据此就可以剖析南京事件的真相,证明松井大将无罪,因为日志中没有写日军的暴行。杨教授批驳说:这些罪行是绝对见不得人的,怎么会写进日记里去呢?日记中没写不等于没干。如果有有力的反证的话,松井当

年在“东庭”上早就提出来了。接着杨又揭露了田中篡改《阵中日志》的丑闻。原来田中出版的《阵中日志》被《历史与人物》的编者发现有 900 多处被篡改,内中有改易、削除和添加,例如把有些中国败兵数由“数万”改为“数千”,把“掠夺”等词删掉等,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办法来证明没有屠杀。杨教授指出,战后日本记者的回忆录、评论家和史学界的书文很多,除前面提到的洞、本多、佐佐木、今井、秦贤助、滝川等之外,还有冈本健三的《我参加了杭州湾登陆》、河野公辉的《杀戮现场的证言》、田所耕三的《因屠杀而对立的攻略战的兵士们》、铃木二郎的《我目击的南京悲剧》等等,这样多的活见证,还能说一百二十名记者,谁都不相信有屠杀这回事吗?杨又说:我想田中可以效法一个人,此人与他同门,也是松井大将的亲信部下,职司专属副官,名叫角良晴。不久以前,他在旧军人机关报《偕行》上发表了她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1937 年)12 月 19 日,扬子江岸草鞋峡一带,堆着十二三万被屠杀的中国人尸体。”杨教授问:角老先生虽不忘故主,可是更重视正义,不知作为同门的田中何感想?

无巧不成书,就在田中出版《虚构》同一天,一本叫作《私记南京大屠杀》(彩流出版社)的书也问世了。作者曾根一夫,静冈县人,1937 年 9 月被征入伍,时年 23 岁。他参加过南京攻略战,这部书是他亲身经历的记录,论调适与田中相反,他在“序”上说:“近来,我觉得战争的传说被歪曲了,其中一点是隐匿战时日军的残虐行为,故意歪曲事实。”他对教科书的篡改事实甚为不满,说:“为政者凡事当秉公处理,但有人想抹消战争中的可耻行动,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因教科书一事与中国发生了政治问题的‘南京大屠杀’。作者斩钉截铁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事实,我敢断言,因为我就是参加南京攻略战的一个兵士,自己曾做过那样的事。”(54 页)他又说:“日军杀戮中国人的人数虽不清楚,但中国方面的数字没有夸大,实际上牺牲者也许比这更多。”(55 页)书中还阐述了暴行的起因,一是由于最初他们从日本调来上海参战时,说是为了维护日本利

益,保卫侨民。好容易战争告一段落,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可解甲归国,一家重聚。这次师出无名,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国,心情很沉重,有些原来性情驯良的人,都变得暴躁起来,于是作出了一些异乎寻常的行为。(60—64页)另外,因为作战队与押粮队脱离,不能及时供应,上级的命令却是“就地征发,自求生存”,实际上就是向居民掠夺。慢慢地,罪恶感消失了,进一步发展为强奸等暴行。为了灭口,索性一杀了之,这是南京事件最初的情况。(55、57、59页)以上这些日本亲历者的见证,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屠杀的起因主要还是上级的命令和对俘虏的屠杀政策。

田中大概自己也感到完全没有屠杀的“虚构论”站不住脚,因此有时不得不扭扭捏捏、含含糊糊承认有一些屠杀事实,但不是什么大屠杀,而是小屠杀,只是几千人。当然他的书中也有举别人的例子上万而自相矛盾,但毕竟比三十万的数小多了。他想以缩小屠杀的规模和数量来否定大屠杀,于是在屠杀数字上做文章,说大屠杀派夸大了数量,以此来减轻或开脱日军罪责。这是由“虚构论”退向了“夸大论”去了。不过,这种同样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理论,仍是不堪一击。

南京军民究竟牺牲了多少人?田中说是两千一百三十六人,约是实际人数的二百分之一。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象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抓住了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的调查报告《南京战祸写真》(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1937—1938)不放,说这个报告是最科学、最可信的一等史料中的翘楚。调查结论是:“全市三分之一被焚烧,古都半化为灰烬”,因日军暴行致死者共两千一百三十六人,负伤者两千七百四十五人。史迈士教授于南京大屠杀后十四周,自3月19日至4月2日的二十多天里,出动金大学生,两人一组,到民居调查。用的是抽样法,即五十户选一,得出的结果以五十乘之。据说因暴力而致死者共两千四百名,其中有百分之十一是出于国军之手,如此说来被日军杀戮的就只有两千一百三十六人了。田中还利用出席座谈会的亩本的



话来作伪证。亩本说：“我确信二十万、三十万那样的大屠杀是没有的。”（《文艺春秋》12月号，1984年，215页）田中又举出曾在南京从事救援工作的末色敏夫的话出来作证，说他听说过日军强奸掠夺等暴行，可是大屠杀的事终于没有入过耳。（《虚构》49页）

杨教授批驳问：这五十选一的标准何在？日军占领期间，居民敢否吐露苦水？短短的二十几天怎能调查清楚？而且调查的只是有人烟的住宅，那些兵燹以后毁坏一空的住宅如何呢？那些家破人亡的家庭又怎样呢？史迈士教授等人的力量有限，获得的资料微乎其微，怎算得清南京全市遭害的总数？而且还有极强的反证，金大另一名教授贝茨（M. S. Bates），是他与史迈士协办，才作成这份报告。此后他在“东庭”作证说，周遭一带尽是日军所杀的尸体，内有妇孺，仅他与史迈士点查，便有一万二千具之多。由此可见两千一百名云云，绝对不可靠，调查的方法也不科学，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田中又说，根据国际委员会报告，自1937年12月13日到第二年2月9日，难民区（或叫安全区）人数为二十万，此外中国防卫军五万，共二十五万，即使一个不留统统杀光也不会到三十余万之数。杨教授首先指出，防卫军五万云云就不符合事实，中国方面载是十五万（《抗日战争中的军事》，194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方面称是十万到十四万。佐佐木到一少将《手记》中说是十万（1938年1月5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的记载为十万（1961年，原书房，284页）。旧军尉鹤饲敏定说是十四万（《诸君》，1985年4月号，74页）。这还可从俘虏和阵亡战士的数目上获得旁证。根据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6日的报道，12月13、14两天，中国兵被俘六七万。又12月8日中支那军发表：“敌军遗体八九万。”洞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俘虏及阵亡者共十一万多（《诸君》，1985年4月号）。所有的资料都表明，防卫军仅五万之数不可信。其次，南京市民原有一百万，避乱他迁后仍有小半，约四十余万，另外还有外地来京的难民数万。当时脱险而出的人如李克痕、佚名的

著述都有这种说法。杨指出：田中在此问题上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整个南京市和安全区混淆了。众所周知，安全区不到四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的八分之一。马吉牧师(John G. Magee)在“东庭”作证说，区外至少有三十万人以上。若照田中所说，岂非八分之七的南京城，以及广大的城外，一无人踪。由此可知，南京陷落时军民合计应为五六十万人，其中三十万被害，不是不可能。

杨教授又指出了史迈士调查报告中的矛盾，认为报告死亡人数和暴行表中比实际少。这在“说明”(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279页脚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看得出来的更多。例如，“根据城内和城墙附近所埋的人数来估计，有一万二千多名老百姓死于暴行，其中还不包括被解除武装的兵士。”第二章第四节中就说得更清楚：“据调查，南京(市内)人口是二十二万一千人，而农村则是一百零七万八千人。在农村，七户中有一人被害，而在城市，五户居民中有一人死伤或被抓走。”这样算来，若以一户四口来计算，那么农村遭难者该是三万八千多，城市一万一千多，加起来是五万左右。这比田中的数要超过二十倍，而史迈士的调查只是冰山一角。

田中还不同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是集体屠杀两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之现场，并举出当时在那里战斗过的日军部队的战史材料作伪证。他说：成友部队在下关抓了五千名俘虏，全部交给了十六师团，一个也没有杀。又说：根据红十字会统计表，这里埋了八千四百具尸体，其中妇女孩子一个也没有，埋着的一定是战死的士兵。杨教授说，这次大屠杀有案可稽，那就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三五一二六号”档案。至于这近三万人的被杀少数目击者怎能看得清的问题，这当然是事后掩埋时清点出来的。据《日寇燃犀录》说，这次集体屠杀，有外侨亲眼目睹。

当然，南京当时情况复杂，时间紧迫，被杀者数量巨大，而且又在敌人统治之下，谁也很难说清精确的牺牲人数，不过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建纪念馆前确定的三十万人之数，还是保守的。

田中还极力否认杀害俘虏，赖不掉就强词夺理制造“杀俘有理”论，再不然就是倒打一耙，归罪于中国，并曲解国际法。杨教授对此也作了有力的驳斥。

杨教授说，冈村宁次大将、佐佐木到一少将、中岛今朝吾中将军等都有透露屠杀俘虏的手记，只是发表都在战后而已。至于战后，记者们回忆录中对此的记载就更多了。中岛的日记（1937年12月13日）中写道：“我们没有留俘虏的打算，当伺机一一收拾。”在其他地方，有这样的记载：“命佐佐木部队解决的约一万五千名，命守备太平门的中队长解决的约一千三百名。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还陆续有投降者到来。”“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很难寻觅。另一个方法，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二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日记中也不时地感叹日军纪律的松弛，例如：“正要盘问的中国将士，却给日军刺杀了。入城扫荡时，连水电厂的工程师和职工都干掉了，所以水电都在停顿状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杀俘证据。而且《对支那军战斗法之研究》中说：中国户籍制度不完备，即使杀害，或流放他处，也不会发生问题。（陆军步兵学校发给军人的小册子，1933年1月印）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杀俘。

国际法是明文规定严禁交战双方杀害和虐待对方俘虏的，可是田中一面极力隐瞒俘虏人数和下落，另一方面又为杀俘有理解释。“虚构”中不知多少次提出了所谓战时国际法。例如他说：“东庭”曾提出日军暴行四百二十五件，其中唯有三百五十名中国军人在12月14日、16日两天，被拖出去枪决，因为他们隐藏武器潜伏在（安全区）内，犯了“海牙陆战法”，其中可能有老百姓，但咎在中国，不该采取这种违法战术。以后又查出了两千名便衣队，全当作俘虏，收在监内。田中指责中国出动了便衣队，连老幼妇孺也参加，引起了日军的猜疑和敌忾心，对于这种违法者，不妨格杀不论。（《虚构》27、37、38、189、190页）而鹤饲在座谈会上也说：抓到俘虏和便衣兵，为了怕他们逃跑或反抗，当然可以当场枪毙，也不犯国

际法。(《文艺春秋》)1986年12期216、229页)杨教授义愤填膺地说,要知道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当祖国山河遭敌军蹂躏时,男女老幼都有反抗的权利,竟说这是违反国际法,这是何等荒谬啊!中国军人防卫祖国首都,反抗入侵的敌人,事败,或以身殉国,或脱围而出,不及走避便暂时隐藏,对这样的人,怎可格杀不论?士兵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丧失了战斗能力,按国际法就应该以俘虏对待,不可任意杀害或虐待。对手无武器换著便衣的人当作战斗中的军人而加以杀害,这才是真正违反战时国际法,何况杀害的许多是老百姓呢?

杨教授在一篇文章的结语中说:“战后不过几十年,日本朝野篡改史实已层出不穷。不错,日本在战时曾作出不名誉的事,然而掩盖史实更不名誉。唯有如实地写出当时残酷真相,才能对战争有所警惕,带来和平。要是肯定战争,美化残虐军人,隐蔽罪恶,将使后人起来效尤,其后果不堪设想!”

### (三)

杨教授对田中正明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批驳是有力的。但是日本国内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一直没有停息。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主要是从上层政要刮起来的。

1986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十月号上刊登了中曾根内阁文部相藤尾正行会见该社记者的谈话(1986年9月7日《参考消息》);1990年10月,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了日本共同社记者对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的采访记(参见1994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今年5月3日羽田孜内阁法务相永野茂门,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的讲话;8月12日,村山富市新内阁成员环境长官櫻井新会见记者的讲话等接连不断地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翻案。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资料也在不断出现。

尤其是前所未见的日、美、德等国及我国的一些档案资料更为可贵。这里将近几年新披露的资料作一些简要介绍,作为杨文的补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1991年第三期《民国档案》杂志上发表了郭沫若的《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这是他在1938年初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为国民政府所拟的重要文件。文稿首次向全世界揭露“南京沦陷后之十余日,每日有卡车十余辆把壮丁运往城外枪决,为数在十万左右”等屠杀事件。文件还列了日军在南京等地抢劫、纵火、奸淫、杀人等种种罪行。文稿签呈的时间是1938年6月22日。

199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在《民国档案》上发表了原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1937年12月16日—27日致日本大使馆函一组。该文件是当时在宁外国友人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重要文件,函中反映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及其附近奸淫、抢劫、屠杀等无所不为的暴虐行径。文件形容“日军残酷之甚,非笔墨可表述”。该文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写,正如郭沫若在为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序时所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该文件有力地驳斥了田中之流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战后捏造出来的”无耻谎言。函件署名者为M. S. B,即美籍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博士。

下面再举美国方面两则资料。

约翰·G·马吉(John. G. Magee 1884—1953),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名美国传教士。从1912年到1940年,他一直在南京圣公会传教布道。1937年12月13日,当南京落入日军之手时,他留了下来,因而目睹了日本人所犯的骇人听闻的种种战争罪行。其时,他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会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同事们被日本人的残暴强烈震慑,并

深深地为受害者们的悲惨命运所激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照料受伤的人,阻止强奸妇女的行为,帮助难民,并保护他们的教堂或公司的财产。他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者,在南京大学医院和其他地方摄下了受害者们的近景影片。这些胶片已成为已知留存至今唯一反映大屠杀事件的原始动态画面。象他的许多同事一样,他证实“从城南到北面的下关,城中遍布死尸”,并报告说,他“曾去过沿江马路……,并看到沿江马路上有大量的死尸”。(引自他 1938 年 2 月 2 日给妻子的信,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4 期,168 页)当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执行主席的乔治·费奇(George Fitch)先生的回忆录说,绝大部分的揭露性镜头是约翰·马吉拍的。乔治曾告诉过他的外孙女马吉是怎样通过窗口拍摄到日本兵赶拢平民,妇女们在一旁跪倒求饶的情景。(转自《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4 期,第 168 页)。

到 1938 年 1 月的晚些时候,屠杀仍在肆意进行。乔治冒着极大的危险,把马吉的胶片的第一部分从南京偷带到上海,在那里制作了四部正片拷贝。其中一部在 1938 年 1 月给了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乔治·罗森(George Rosen)。这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影片历尽艰辛,战时曾在中、日、美及香港等地映出。1991 年美国南京大屠杀联合会,请一位美籍华人王彼得(Peter Wang)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叫《马吉的见证》,并在亚洲和美洲十五个大城市放映。1985 年 8 月 15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时,曾放映了一部国内制作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其中大部分镜头取材于马吉的原始影片。此部纪录片八十年代已在全国广泛传播。

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存有一份名为“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日军暴行”的资料。作者是一位美国传教士,1937 年 12 月日军侵占南京时,他正在南京鼓楼医院帮助做总务工作,亲眼看到日军许多可怕的暴行,从 12 月 19 日到次年 1 月 15 日陆续以书信的方式记述了日军许多强奸、烧杀、抢劫的具体暴行。例如:12 月 19 日写道:“(日军进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里一直是人间地狱”,“我

从来没有听到或谈到过象这样残暴的行为。强奸,强奸,还是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发生一千起,白天也发生许多起。如果进行抗拒,或者似乎有些不满,就会遭到刺刀、枪弹捅、射。我们每天都能记下数以百计的这种事例。……那些被怀疑为士兵的人以及其他,已成百地,不,成千地被带到城外去枪毙。”12月29日写道:“南京出现一片凄凉景象。自日军进城以来,大部分商店货物被劫,商店被烧毁了,主要街道一片废墟。”1938年1月3日写道:“今天上午来了另一位妇女,境况悲惨,经历可怕。她和另外四名妇女曾被日本兵抓进一个(日本)部队医院,日本兵白天要她们替自己洗衣服,晚上对她们进行轮奸。她们里面有两位每天晚上被迫要满足十五到二十个人的欲望,而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位则要满足多达四十个人。”11月6日写道:“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残酷地杀害了。作者本人亲手掩埋过的尸体就有三十八个以上,都是从附近大街收拢来的,多数是士兵。”就这份资料,已可看出当时南京的“人间地狱”状况了。(摘自《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第5期,1985年12月)

德国方面的档案材料恐怕更具有说服力。(见《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2期)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档案馆(今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藏有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等报告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情况的档案资料。在这份长达190页的档案材料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纳粹党负责人拉贝、英国记者史密斯和美国牧师马吉以其亲身经历,详细、清楚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后究竟杀死了多少中国人,看了这份材料,“东庭”作出的30万人以上的结论是可确信无疑的。罗森在1937年12月24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途经下关时“除了看到严重的破坏外,还看到一些死尸堆、尸体穿的全是老百姓的衣服”。他在1月15日的报告中说:“日本人数周恐怖统治,使得城里的商业区……变成一片废墟……日本军队放的火仍在燃烧”,“外国人包括拉贝等人都曾抓获正在干伤天害理事情的日本军人”。这份报告还

举出了日军以中国人作靶子练习刺杀的实例。

罗森在1月20日报告中说,日军海军少将近藤曾对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在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还有三万多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除了用机关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

罗森在2月1日的报告中提到日军天天有暴力行为,如枪杀和强奸妇女并致死等,有一家13口人死了11口,剩下2名儿童让拉贝先生领走了。

罗森在2月10日的报告中,报告了他获得了约翰·马吉拍制的带有解说词的有关日军暴行的影片,他并要求把这部片子给他们的元首和总理看看。这天报告中还写了他和拉贝曾两次去观察一家四口被杀和打捞120具死尸的情况。

罗森在3月4日的报告中写道:直到3月4日,在南京下关附近的扬子江面上还漂浮着大屠杀后留下的三万具尸体。

英国记者史密斯在他关于1937年12月9日至15日的南京战况中写道:“在南京城北门前有一大片一米多厚被日军集体杀害后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尸体。15日他由南京去上海登船之前在港口附近空地上看到有几千名被绑起来的中国人,日本人对他们一批一批地用机枪扫死。

拉贝在1月14日写给一个名叫W·迈尔的人信中写道:“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数周的烧杀抢掠,大约有二万名中国妇女被强奸,成千上万的平民惨遭杀害,……整个南京城被日本人烧毁掉三分之一,杀人纵火,奸淫掳掠,至今仍在继续。”

从罗森、拉贝的报告,史密斯的报道和马吉电影解语词中都可看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绝灭人性、惨不忍睹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日本方面一些资料。

《朝日新闻》1984年4月23日曾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中山重夫老人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他说:“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



坦克的沿途看到了累累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妇女和老人的尸体。”他曾在日本各地巡回报告,揭露日军暴行,并到过中国,听众达数十万,他的反战活动早已拍成影片,片名叫《中山老人的证词》。

1986年12月8日,《朝日新闻》刊登了该记者本多胜一一篇采访报道,内容是:亲身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名士兵现化名小林的忏悔自白。他对记者说:“我的余生不多了,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我想如实地把当时的情景讲出来。”其中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扫荡混入外国租界和难民中的败兵,仅第四连就在玄武门内侧枪杀了五百人。”接着记者详细报道了日记内容。

1987年7月7日,《朝日新闻》又将三名原侵华日军士兵当年的作战日记公诸于世,以纪念卢沟桥事件50周年,作出的证词,名为“我看到了南京大屠杀”。其中有“决不许再度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等词,有各部队屠杀中国人的详细描写。这三名战士是东史郎(75岁)、增田六助(78岁)和上羽武一郎(71岁)。记者并公布了他们的住址、职业等情况。

1991年,本多胜一还发现了一部多达25本的战死在南洋的日本兵的日记,其中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

台湾中央社记者赖胜权1994年9月11日专电,报道了“美国在解密的日本电报中发现南京大屠杀有卅万人遇害”的消息。报道说:这份电报是外务省1938年元月17日拍给当时驻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的,发报人是当时的外相广田弘毅。(见台北《中央日报》,1994年9月12日)

辽宁省档案馆在《民国档案》杂志1994年2、3期上发表了满铁道株式会社档案中一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史料来源是:日军占领南京后,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松冈功筹五人组成的“南京特务机关”(也叫南京特务班),进驻南京,协助日军做侵占工作。这一组档案就是该班写给满铁有关部门的1938年头三个月每月一次的三次工作报告。报告字头框有“极密”字样。报告主要是

为了表现特务班的“工作成绩”，自然不可能提及日军暴行，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仍可窥见南京大屠杀的概貌。

一月份的情况报告说：一月初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该会于一月六日从国际委员会中接收了 20 万难民。我军认为，由于南京整个被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因而在这些难民中，必然潜伏着很多残败兵、不法分子。因此，直至一月六日每天进行严格搜查，努力将其查出。查问全体人员之后，已清除多数残败兵。”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京人口如杨文所说，已从五、六十万人降至二十万了。那么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难道难民区以外就没有人了吗？而他們又逃不出去，因为“南京整个被包围”。那末，就只有一个解释，难民区以外的大多数人被屠杀了，这与“东庭”认定的和杨教授分析的被杀人数是 30 多万人大体上是一致的。

那么被“清除”的所谓残败兵和不法分子究竟有多少呢？在二月份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年一月五日间，协助中岛兵团进行盘查活动，清出了大约为 4000 名的残败兵及抗日分子。一月六日到二月二十五日间，特务机关得到天谷警备支队的协助，又在城内外继续盘查，清出约 500 名。”谁都知道，大屠杀主要发生在最初六周，而集体大屠杀主要在最初 10 天，而那时屠杀人数都不在特务班这份统计之内，因为它的统计数是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的。

从特务班三月份报告中关于掩埋尸体的情况看，南京市民被杀人数之多，也可想见。“红十字会的尸体掩埋队（队员约有 600 名）一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尸体，截至二月末已埋掉的尸体约达 5000 具，成绩昭著”。“至三月十五日止，已把城内 1793 具、城外 29998 具，共计 31791 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和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这只是红十字会一个队埋尸的人数，其它还有主要的埋尸组织如红十字会和崇善堂等埋尸的人数和最初大屠杀被抛入江中以及焚尸灭迹的人数均不计在其内。又，特务班统计收尸的开始日期是“一月上旬”，离大屠杀一

个月了,而且到三月中旬,仍然没有将尸体清除完毕,“在城外各地还散搁着一些尸体”。

以上诸材料,无可争辩地证明,南京大屠杀非但不是“虚构”,而且被杀人数 30 多万也确是事实。

最后,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个人也有一段亲身经历,可以证明这次大屠杀,并非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才开始的,而是日军从攻陷上海西进沿沪宁铁路和从杭州湾登陆沿宁杭公路一路进军就开始了,因此沿途杀死的不计其数的人,且不在 30 万数之内。

我原籍江苏宜兴,是宁杭公路所经之地。抗战那年,我 15 岁,因“八一三”战事已起,失学在家。12 月上旬一天(已记不清具体日子)从常熟、昆山逃下来的一批难民,途经我村,夜宿我宗族祠堂内。听他们说,日军一路用机关枪开路,见人就放枪,许多人死了,还沿途放火。我和家人以及一些同姓村人听了吓得连夜整装,第二天一早就跟他们一路步行西去,准备到南京后再乘舟车转大后方。不料到溧阳县境内上沛埠镇乡间时,许多沿宁杭公路两侧居住的居民,也纷纷逃难来。次日白天就不时听到了枪声,夜间看见公路一带火光冲天,大家明白这是日军在“过兵”(即行军)了,因为中国军队早在大约一周前就撤退了。这时,我们感到敌军既已超前而去,我们西去无用了,因此,只好仍折返家乡。再度穿过公路时,前几天途经的离公路只有三里路的上兴埠镇,已是一片废墟。后来回到家乡,知道在这期间有亲戚二人被杀被奸,至于房屋被毁和他人被杀被奸的事例就更多了。此后数年,我们就一直过着“闻风而逃”的亡国奴生活,饱受着敌人不时地扫荡和每年夏秋雨季下乡抢粮暴行之苦,直到 1942 年我辗转流亡到昆明去升学,敌人暴行从未止息。后来抗战胜利再回家时,昔日的村祠早已不见,叔伯家的房屋也被寇寇拆毁,说是都被日军拆走建工事了。

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五十多年,结论也已作出。但是从 1963 年以来,日本不时有人进行翻案活动,想乘国家经济大发展之机,重温昔日“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恢复军国主义。中国人民

至今没有听到日本政府当局说一句“正式赔礼道歉”的话,而且日本政府中还不断有人搞翻案活动,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觉。历史的帐还是要记的,为的是避免日本重蹈历史覆辙。对偌大的一桩杀人事件,采取鸵鸟政策,掩耳盗铃,装聋作哑,或者死硬狡赖,都是无济于事的。历史不容篡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